

社会与思想丛书

资本主义 的动力

&

布罗代尔 著

LA DYNAMIQUE DU CAPITALISME

社会与思想丛书

S

资本主义的动力

&

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杨 起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天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的动力/ (法) 布罗代尔著; 杨起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4 (1997.11 重印)
(社会与思想丛书)
ISBN 7-108-01014-3

I. 资… II. ①布… ②杨… III. 资本主义社会-研究-文集 IV. K0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4087 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牛津大学出版社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5
字 数 63 千字
印 数 10,001—17,000 册
定 价 5.80 元

总 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在大陆出版“社会与思想丛书”，旨在更有系统地积累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我们希望，这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社会与思想丛书”将主要注重对西方社会与思想，以及其他非西方社会与思想的研究。如果说，晚近十余年来的中国变革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的真正历史出场，那么，70年代以来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无疑莫过于对“西方现代性”历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检讨：在经济领域，所谓“福特式大生产方式”的危机不仅促发对“后福特时代生产”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们重新检讨“福特式生产”的历史成因及内在阙失；在政治领域，西方现存体制与民权运动以来民主发展的尖锐张力，已重新激发西方近代以来“自由主义 v. s. 共和主义 (Republicanism)”这一基本辩论；在文化领域，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不但已全面动摇近代西方苦心营构的文化秩序和价值等级，而且更进而对“西方传统性”本身发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这些都提醒人们：自上世纪末以来一

直在学习西方的中国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样全面重新检讨中国人以往对西方的理解和认识。因此,本丛书将不仅包括对当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强调对西方历史传统的重新认识,特别是西方传统内在差异性的研究。

本丛书定名为“社会与思想”,自然表达了一种期望,即:对社会制度层面的研究与对思想意识层面的研究,应该日益结合而不是互不相干。从学科的角度讲,亦即希望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与人文及哲学领域的研究,能够相互渗透,相互促进。通过多学科的合作与跨学科的研究去深入认识中西现代性与中西传统性,以往那种僵硬的“传统 v. s. 现代”、“中国 v. s. 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或将会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类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学术世界为此任重而道远!

社会与思想丛书编辑委员会

前 言

这本小册子刊载的是 1976 年我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所作的三次学术报告的讲稿。讲稿以《对于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反思》为题译成英文,此后又以《资本主义的动力》为题译为意大利文。本版对于原稿未作任何更动。1979 年,阿尔芒·科兰出版社发行了我写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现谨请读者注意,讲稿问世在先,书稿出版于后。然而,在我讲演之时,鉴于书稿已基本完成,我遂应约介绍了它的要点。

费尔南·布罗代尔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对于物质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再思考 1

第二章

交换纵横谈 25

第三章

世界的时序 52

附录：终天之见 81

——介绍布罗代尔在生前最后一次研讨会上的言谈

第一章

对于物质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再思考

《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部抱负颇大而力有未逮的长篇著述，我是在1950年开始运筹的，至今已有些年头了。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给我出了这个题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友好地强加于我的。当时，他拟就了出版一套通史丛书计划，总题为“世界之命运”(Destins du Monde)。作为主编的他，在1956年过世了，我不得不接续这套丛书的编纂工作，其困难自不待言。吕西安·费弗尔自告撰写《15世纪至18世纪的西方思想与信仰》。此书本应配合与补充我的那本，与之比翼，然不幸却永无出刊之日了。我的著述因此终古成为孤篇。

《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本书尽管大体上只限于经济领域,却仍然给我带来了不少难题,这是由于所须运用的资料浩大而繁多,由于其主题引发着诸多争议——经济,作为孤立的自在体,显然是不存在的,还由于不断演进的编史业务无休止地生发着困难,因为它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虽然相当缓慢,却必须将人类其他的科学收录归案。我提到的这个编史业务不断推出新的史料,年年岁岁面貌不同,我们要跟上它,必须跑步前进,必须打乱我们惯常的劳作,必须多多少少地适从那些从不相同的规定与请求。美人鱼以其动人的歌吟诱引船夫触礁,使他们不得前进,而我呢,也被上述美人鱼歌声般的新史料迷住,甚感赏心悦耳。就这样,时光年复一年地流去,我曾一度气馁,不知我的航船能否抵达口岸。我写《地中海史》,历时 25 年,写《物质文明》也花了近 20 年的时间。耗时确实太多了,过分地多了。

第一节

现今才正在修纂的、以经济为门类的历史遭遇上一些偏见:它不是高品位的历史。吕西安·费弗尔新撰修的才被视为高品位的历史:见诸于其笔端的不是雅科布·富格尔(Jakob Fugger)^①,而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②,而是弗朗索瓦·

① 雅科布·富格尔(Jakob Fugger):德意志一个大实业家族(延绵 14、15 和 16 三个世纪)中一位重要成员。该家族所办的企业是资本主义初期贸易公司的典范。

拉伯雷(François Robelais)^②。与另一门类相比,不管它的品位是高,是不高,还是不太高,经济史同样提出了我们这个专业所固有的一切问题: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审视,经济史就是人类整个体的历史。它是人们视之为大角色的人物,如雅克·科尔(Jacques Coeur)^④,如约翰·劳(John Law)的历史^⑤;它是大事件的历史,是情势和危机的历史,它也是整体与结构长期缓缓演变的历史。而这,恰恰正是我们的难处所在,因为,我们涉及的是四个世纪和整个世界,如此大量的事实和解释,怎样组织才好呢?必须进行筛选。就我而言,我选择了长期形成的深层次的均衡与失衡。在产业革命前的经济中,依我之见,首要的义理就是当时那种仍然是初级的经济所蕴含的刻板、钝滞和艰涩,与一种现代化发展所引发的有限的、参与人数不多的、然而却活生生、强有力的运动共存共处。一边是村落中的农民,他们过着绝少与外界来往、几乎是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另一边是正在伸展着的市场经济与

②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德国人,16世纪欧洲宗教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的创始人。在基督教历史和西方文化史上都是重要人物。

③ 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obelais 1483—1553):法国作家。他的渊博的人文主义学识为他赢得了终身声誉。他对法、英两国的一些作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④ 雅克·科尔(Jacques Coeur 1395—1456):法国商人,国王查理七世的顾问,曾任国家财政总监。科尔是他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体现了商人中等阶级的兴起。

⑤ 约翰·劳(John Law 1671—1729):苏格兰货币改革家,开发了美洲法属领地的“密西西比计划”的制定者。他曾在巴黎创办一家有权发行纸币的银行。

资本主义，它们在蔓延，在一点一点地铸造着并且也已经预示着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总之，至少有两个天地，两种陌生的生活，而其各自的实体却又互成因果。

我想首先谈一谈钝滞现象。这东西看上一眼是看不大明白的，处于人的清醒意识之外。人在钝滞的状态中，被驱动的成分远较能动成分为多。这就是我的著述第一卷所试图凑合着解释的东西。在1967年初版时，我曾将此卷题之为《可能的与不可能的：面对着日常生活的人》，尔后又改成《日常生活的结构》。当然，书名无关宏旨。即使这种追寻看来没有把握，处处可能出现漏洞、陷阱和误区，研究的对象却是再清楚不过的。说实在话，一切使用过的字眼——无意识、日常性、结构、深层——其本身就是隐晦不易懂的。关系到我们这个题目，答案不可能就是心理学中的无意识，虽然这个无意识与此也有关连，虽然有一种集体无意识或许值得了解一下。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① 研究集体无意识的实质，被折磨得好苦。言归正传，钝滞这个大题目，少有不从其短处涉及的。它仍等待着历史学家来研究它。

至于我，仍执著于具体的标准。我起步于日常生活，起步于那些生活中对我们尽责、而我们竟不知晓的东西：习惯

^① 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证实了弗洛伊德的许多论点。1916年发表了《无意识心理学》。后来提出了无意识和原始意象等概念。

——称为老套数更好——即那些千般万种的自发自止的行为。对于这些行为，任何人都不用事先决定是干还是不干，它们确实是在我们充分的意识之外进行的。我认为人的生活一大半淹没在日常琐事中。无数的行为都是自古继承下来的，无章无序积累的，无穷无尽重复的，直至我辈。它们帮助我们生活，同时禁锢着我们，在我们整整一生中为我们作出决定，指令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这里所说的有外因的挑动与诱动，有内因的冲动与搏动，有模式的照搬，有采取行动的各种方式或者不得不采取行动的情况。这些东西有时候，甚至常常超出人们的估想，可以被追溯到久远的混沌年代。积年累世的、非常古老并依然存活的往昔注入了当今的时代，就像亚马逊河将其混浊的洪流泻入大西洋一样。

这正是我试图用“物质生活”这个方便的——但如同所有的因其义过广而不确切的——词汇所要抓住的一切。当然，物质生活只不过是人类营生的一部分，从本质上讲，人既有创意，也墨守陈规。但是，我要重复地说一句，在开始的时候，我并未刻意确指这种逆受多于进取的生活所具有的局限及性质。我是想看一看，也让大家看一看这一块平庸度过的、大体未被看清的历史，深入进去，与之熟悉。

钻进去之后，也只有在钻进去之后，才是再走出来的时刻。在进行了这场水底捕捞之后，深刻的、直接的印象是我们仍处在非常古老的水域之中，仍处在一部几乎没有头的

历史之中。两三个世纪以前能够找到的史实，十个世纪以前也能找到，甚至有时今天仍可亲眼看到。我所理解的这种物质生活，人类在其先前的历史进程中已将之深深地融入了自身的性命里，宛如纳入了人的五脏六腑。对于人来说，过去获得的经验和受到的毒害都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需要，变成了平庸之物。而对于这些东西，没有人去细心观察。

第 二 节

此即我首卷书的主线。其目的是进行一番探索。光看标题，各章的内容也就不言自明了。标题如清单般地开列出催化着并推动着物质生活总体前进、而且在此之外或在此之上也推动着人类整体历史前进的隐濛不显的力量。

第一章：“人口数量”。推动人和其他一切生物繁衍生息的因素，乃是杰出的生命之力。乔治·勒费弗尔称之为“向春性”。当然，此中尚有其他的向性和定数。构成人类的物质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它在个体的人并不知觉的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人类群体的命运。在这样或那样总的条件之下，人类各大群体的数量或者过多，或者不够多，多多少少，交替产生。人口发展的机理是趋向平衡的，然而臻至平衡的情况颇为少见。在欧洲，从1450年起，人口快速增长，这是因为应该、而且当时也可能补偿上一个世纪黑死病所造成的大量死伤。局面得到了恢复，尔后又折

丁损员。在历史学家的眼中,如同预期的一样,人口之潮涨涨落落,落落涨涨,勾画揭示出有倾向性的规律,这些长期规律一直延续到18世纪。至此,不可逾越的界线才被冲破。从那时开始,人口便不断增长,没有停滞,没有反向运动。

总而言之,在18世纪之前,人丁系统被围在一个几乎不可捉摸的圈子里。人口数量刚要触及到圈子的周边,几乎马上就出现退缩。恢复平衡的方式和时机并不缺乏:匮乏、灾荒、饥馑、苦日子、战争,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种种疾病。现今,疾病仍在为害,而昔日,疾病却是浩劫之灾:定期流行的鼠疫迟至18世纪才被驱出欧洲;斑疹伤寒,再加上严冬,将拿破仑及其大军困于俄罗斯的腹地;伤寒和天花经常施虐;早先出现在乡村的结核病于19世纪侵入城市,变成了那个浪漫时代的时髦病,最后是性病,在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由于几种细菌的结合,梅毒又获得新生,甚至大规模地突发起来。差劲的卫生条件和劣质的饮用水则造成了其他的危害。

人,娇嫩嫩地生下来,怎能逃脱这一切侵害?婴儿死亡率极高,情况如同今天的某些发展中国家,或如同昨天的发展中国家。普通的卫生状况岌岌可危。我们拥有16世纪以来的数百份解剖报告。读后令人震惊不已。报告中对于肢体和皮肤变形及损伤的描述,死者肺部和腹部中超量的寄生虫,能把今天的医生惊呆。所以说,直至不久以前,一种有害健康的生活状况无情地贯穿着人类历史。当我们琢

磨“那时有多少人？”“他们有什么病痛？”“他们能防治吗？”等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上述的境况。

第一章之后的章节提出了其他的问题：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都是些没头没脑的问题，不做一次考古勘察恐怕难以作答，因为，你们都知道，传统历史籍册并不记载人们吃什么，喝什么。而在许久之之前就有这样一种说法：Der Mensch ist was er isst〔其食造就其人〕，这也许是用德语做文字游戏所得到的趣味之作，然而，我不认为应该将那么多的食品——从糖、咖啡、茶到酒——的出现看作是细枝末节。实际上，它们每每都是说不完的丰富历史。人们无论如何不能过分渲染谷类——古老食品中的当家作物——的重要性。小麦、大米、玉米是非常古老的遴选和无数连续试验的产物，在历时千百年的“导生”（法国最大的地理学家皮埃尔·古鲁的用词）作用下，这些遴选和试验遂成文明的取向。小麦消耗地力，要求土地有规律地休闲，因此它就带动了并且使人们有条件从事畜牧：若是没有家畜、犁具、挽具和大车运输，我们怎能想象欧洲的历史？稻谷是在园艺中培植出来的，一茬接一茬，人们就没有多余的土地放养牲口了。在一日三餐中，煮玉米吃自然是最方便、最简单的饭食了。玉米使人们有了闲暇，因此出现了农民轮流值勤的杂役队，因此才有了美洲印地安人的宏伟建筑。派不上用场的那一部分劳力被社会征用了。此外，我们还可以讨论上述作物在食谱中所占的份额和所提供的热量，

可以讨论历代食谱的不足之处和变化。与查理五世(Charles V)帝国的前途相比,或者与路易十四时代的所谓法国独领风骚的短期而有争识的光辉相比,难道这不是一些同样引人入胜的话题吗?当然,这是些产生过严重后果的话题:酒、烟草等古老兴奋剂的历史,尤其是烟草风靡世界之势,难道不是在警告我们对于今天更具危害性的兴奋剂要倍加警惕么?①

关于技术,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现象。技术确是一部令人赞叹的历史。它和人类的劳动,和人类日常在与天和与己斗争中所取得的很缓慢的进步密不可分。为了做一件工具或造一件武器而磨石、刻木、打铁,或使用猛劲,或和缓而单调地运力,这一切都是技术,历来如此。这不正是一种非常基础的、从本质上讲是保守的、变化缓慢的、由科学(是其迟到的上层建筑)慢慢接应的活动吗?经济上的大规模集中唤来了技术手段的集中和技艺的发展:15世纪的威尼斯兵工厂如此,17世纪的荷兰如此,18世纪的英国亦然。每次风云际会都少不了科学,不管它是如何的稚拙。科学是被硬拉进来的。

一切单项技术,一切科学因素历来在世界范围内交流,周游世界,传播不断。然而,多种技术的联结体和组合物传播得并不好:光有艄柱舵不行,还要加上搭接法制造的船

① 查理五世(Charles V 1550—1558):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壳,还要给船加上火炮,还要掌握远洋航海术。同样,资本主义是各种手法、程序、习惯、竞争性能的总和。远洋航行和资本主义并未整体传播。是不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才使远洋航行,才使资本主义铸成了欧洲的霸权呢?

好了,也许你们要问我,你为什么要用本卷的最后两章论述货币和城市?因为我不想第二卷中论及此事,就是这样。但是,单单这个理由显然不足以服人。道理在于,货币和城市渗浸于不入记忆的的日常性和最新最近的现代性。货币是一项非常古老的发明,在这里,我是把它作为加速交换的手段而谈论它的。没有交换,也就没有了社会。至于城市,史前即已存在。城市乃是最普通生活的古久累世的结构。城市是一些能够适应变化,能够强劲助变的增殖器。可以说,城市,还有货币,造就了现代性,而同时,根据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①所钟爱的对等法则,现代性,即人类生活中运动着的组合,又推进了货币的扩展,造就了城市日益增强的专制。城市与货币既是发动机,也是显示器;它们引发变化,它们也显示变化。它们又是变化的后果。

第 三 节

如此说来,勾勒出辽阔的习惯性、或曰例行性王国的轮

^① 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 1894—1965):法国社会学家,主张社会学应该从整体上来分析社会现象。